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 著

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
A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 著

S
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

A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 赵旭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

(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300-23435-9

I. ①结… II. ①赵… III. ①吉登斯 (Giddens, Anthony 1938—) —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426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社 会 学 文 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琳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价值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

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注中国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

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自序

最初答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同意为他们的系列丛书撰写一本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学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逼迫一下自己，把以前在不同时期写下的阅读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也算是对于过去几年私下里偏好的社会理论研读做一个交代。但是在真的签约之后，我却发现，这绝非一件很容易完成的工作，所以稿子也就一拖再拖，还好编辑一直耐心等待。面对一部写成的书稿，自己总是有无限的伤感，觉得现在写东西的时间，经常会被各种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切割成碎片，因此人的思路也往往是四分五裂的，不大容易粘连起来，即便粘连起来，也总是不那么顺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下些苦功夫，自己认真地去做一下，哪怕这段时间都耗费在这一件事情上，只要能够做成，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这部研究吉登斯社会理论思想的书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影响下写成的，前后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追随补课的指示

再细想想，之所以有如上的这些想法，是因为，在那

个时间段里，我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晚年所一直提醒我们这些学生辈的要去“补课”的“指示”。老先生不仅对别人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九十几岁仍从头开始读书写作，去请人借来英文原著耐着性子阅读，然后再一段一段地亲自写成可以发表的文字。记得这些文字先是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之间传阅，这些打印稿有个统称——“存稿”，指九十岁以后写下的文字，一年一份，比如《九十存稿》《九一存稿》之类。在我自己的书柜中还留存着当年费先生手写下来变成打印文字的那些单册印本，这也算是一份激励自己时时去问学求索的励志之源。而他晚年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成的《师承·补课·治学》^①一书，应该可以算是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读书与补课”这项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和实践成果。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是受到费先生的这种召唤或者指示而去用心读书和写作的，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时还算是年轻一辈，对社会学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于学术追求本身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我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去。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下来，我还能够在许多事并不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写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时那些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而这部原本类似命题作文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了费孝通在其学术历程晚年所提倡的“补课”精神而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再来看我要研究的这位现在已经被英国皇家封了爵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著作，前后出版过30几本书，还有那么多看都看不完的文章。面对这些文字性的东西，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对他的文字进行中文翻译的体验，但我心理上一直都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觉得在时间允

^①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

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直接去读原文而不是翻译，这至少可以减少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所带来的误解，不然真弄不清究竟是译者误解了作者，还是读译者作品的读者误解了原作者。我想这类扯不清的笔墨官司本身毫无乐趣可言，不论对于法庭上的原告还是被告而言，都似乎是一件颜面尽失，里外都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耐心地去读原著，这样也许会更加放心一些。而且读原著一方面学习了英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体会作者的本意，一举两得，确是一件快乐之事。不好之处大概就是要多花费时间，但是我想，时间的花费总是会有回报的，只有耐心读进去才能真正体验到这种回报。我后来甚至觉得，不仅我需要这样读，就连我的学生们也应该这样读，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无语言障碍的彼此之间的理解。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带着自己的学生们一起读吉登斯那些难懂的论著，其中就包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①这本书。

我有个习惯，自从有了学生之后，不管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一起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我也曾经有个和学生一起搞的读书会，要求学生们定期聚会，差不多是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借用了费先生给我当年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称为“公正读书小组”，我甚至还为这个读书会每期印刷了少量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录，觉得那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于吉登斯本人的作品，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就发觉，很多人都在引述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论文^②中就频频引用此文集，这就更加引起了我去细致阅读此书兴趣。实际上，这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② 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984, pp. 126 - 166.

本文集在1979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那时也可以说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虽然才40岁出头，但已经声名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了。

由此，我便专门找来这本书与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逐段逐段地讲，直到弄明白吉登斯究竟是怎么想的为止。主持并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于我自己而言确实是有收获的，这样的安排逼着我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去阅读，每天又都会专门记录一些零散的笔记。日久天长，在方便储存与编排的电脑的帮助下也凑成了一些看起来有系统的东西，至少对于吉登斯最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的真正含义有了许多自认为心领神会的理解。可以说，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这本文集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我的很多文字和叙述都脱不开那本书的风格，这至少可以从本书的行文中看出来。

如果再往回追溯上去，我最初接触到吉登斯的作品大约是在1997年的早春。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正在着手组织翻译吉登斯的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就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最初是由方文教授独自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因为出版合同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便来约我一起做这件事。以前，我虽有一些翻译的练习，但是很难成什么气候。在接下这个合作翻译的任务之后，我几乎一整天都会泡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北大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机房里，一边看着英文原稿，一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汉字，困了就倒卧在办公桌或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样坚持了差不多三个多月才宣告完成。到了2000年，时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马戎教授又专门委托我来主持翻译吉登斯所撰写的有着广泛读者的《社会学》教科书第三版。后来因为各种杂事的烦扰，这份大家集体的翻译工作同样是一拖再拖，结果新的英文第四版又出来了，只能再遵照出版社编辑的意思按照第四版去重新核校，那几乎可以看成是一次全新的翻译。这个故事在2012年翻译吉登斯那本《社会学》第六版时再次重复，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第六版的初稿翻译出来，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吉登斯英文版的第七版在2013年又出版了，结果又只能一切重来，依照这新的第七版重新翻译，直到2015年5月完成译稿，10月才正式出了中文翻译

版。不过，在这耗费漫长时间的翻译校对历程中，我也渐渐揣摩出一些吉登斯所真正想要表达的那种社会学的要义，这对我后来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本科生课程大有裨益。

结识吉登斯

我很荣幸有过两次机会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那时吉登斯陪同布莱尔首相访华，他在自己的行程中顺便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他的著作的汉语翻译者进行座谈。那大约是在1999年的冬天，由于是隔着圆桌的远距离的对谈，也就没有得到多少机会去单独请教，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像徐志摩描写“康桥”的那份思绪，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恰巧吉登斯自己还是徐志摩的校友，都属于与剑桥这个地方有缘分的人，只是吉登斯显然少了徐志摩那份诗性的浪漫。另外一次见面则是我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做“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学术奖”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楼狭窄的大厅里，我不仅见到了鬓发染霜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教授——几年前刚刚故去的英国最伟大的女性人类学家之一，而且还见到了刚刚主持完我参加的这一场演讲的吉登斯教授。那个时候感觉吉登斯教授特别繁忙，他跑出演讲大厅，站在那里，似乎也只是为了换换空气，休息一下之后，接着还要去参加下一场演讲或之类的活动。因此，那时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也不过只是与其打了个照面，寒暄了几句，没有再多去叨扰。中间我因为《社会学》第四版的序言撰写曾经写邮件去咨询过他，他也曾经答应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个简短的序言，但后来也因为事情多而搁浅了，至于后来也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中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他说不必那么规矩地叫他 Anthony Giddens，只要叫他 Tony Giddens 或者 Tony 就可以了，这种称谓着实让人觉得亲近和蔼，毫无世界知名大学者的架子。再后来，在翻译吉登斯的《社会学》第七版的时候，我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他有过一些邮件往来，这些陈年往事都在我

给这本书中的中译本所写的后记中一一交代了，在这里无须赘言。^①

研究吉登斯

尽管跟吉登斯没有太多的谋面，我心里对他却一直很是崇拜。凡是他的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见到了总要买上一册，留在案头，有时间便去翻阅，今天想来这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情。多年下来，他的书我还是认认真真看了几本的。

可以坦白地说，我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理论的，我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一个理论家，那样看起来会更加不自然，多少像个小丑了，尽管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的著作，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②，那论文里甚至还有很大部分牵涉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可以这样说，在卡尼曼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十年的1992年春季或者更早一点，我实际上已经开始拿他的实验范式在中国的被试中间加以验证了，但在那时的学术背景下，身处畿辅之地，偏安一隅，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你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与社会心理学家方文谈起这件事，他也觉得这似乎是很值得去自我炫耀一番的。后来我还真一时晕了头，当时好一阵子沉浸于一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之中，想来真是可笑。确实，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思考，平心而论，那也只不过是一份闭门造车之下没有太多自己观点的一般性的验证而已，确实也不值得再去提及了。所以已经泛黄了的蜡板打印出来的文稿就丢在了书柜的角落之中，让它尽情地变旧了。不过先前的那些对于西方心理学史中各位大家的研究经历，确实使我对于人的行为解释的各种理论都充满好奇，从来也没有对此失去兴趣，不论是在之前的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之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乃至到了现在所专注的人类

① [英] 吉登斯、萨顿：《社会学》，7版，1101～11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赵旭东：《对心理学上的两种阐释模式（行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

学研究中，这种智识的追溯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自从由心理学这个行当转到社会学中去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社会学的解释都是一开始就把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好像以前自己下功夫去阅读的心理知识在社会学的广袤领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在细细研读吉登斯的作品后，我有了一种能够重新找回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知识之间在阅读上的连续性的那种感受。换言之，在吉登斯写下的字里行间，我多了一份亲切感。可以说，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尽管大家路数有所差别，但是一些基本问题在骨子里还是能够相通的。由于吉登斯教授自己有心理学的一些背景，因此他在谈论人的社会行为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也就是他后来所谓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作为行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在心理学中也曾经一度被抛弃，甚至被认为应该彻底铲除掉，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新、老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所占据的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一些有关人的认知现象的再发现，认知的概念才又被重新捡拾回来，由此，心理学界被认为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革命。这种认知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学科，经济学首当其冲，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隐含有这种革命的影子的，那位我早先曾经追踪过其研究的卡尼曼先生就是研究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人的认知如何会发生一种误判，也就是非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人的思考中发挥作用。^①而吉登斯的思考应该是沿袭了这样一种认知革命的新思路，只是他更多地从社会学理论的唯一理论路径上去想问题，因此他会考虑一种思维的结构如何可能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而这种结构如何又会被固化下来，出现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然后又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一种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变迁之中的连续性的插曲。^②这些不同于静态功能论和结构论社会学的考察，使吉登斯真正理解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真

① See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参见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载《江海学刊》，2012（4）。

谛，即一种变动性的存在，这多少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那种意思。^①但是，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表述更加社会学化，也就是他在考虑一个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延续性背后的运行机理问题。他认为在这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之中，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他所谓的社会“控制的辩证法”。^②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得到加强。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③，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在这信任出现裂痕之处，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公共事件的，还涉及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了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今天的我们，也许并不像科学家那样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说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个悬在空中、只靠手中的一根竹竿来尽可能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会有从钢丝上跌落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了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

① 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440～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英]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